
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 30 年综述

——以纪念《日本学刊》创刊 30 周年为主线

吴怀中*

中日两国是近邻，中日关系一向被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30 年来日本政治领域^①持续出现了诸多令世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在治国理政大目标上，从追求“国际国家”（实为“准政治大国”）、到“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再到“全面大国化”的“国际社会主要玩家”^②；在政治思想上，从新保守主义，到总体保守化，再到民族保守主义；在政党体制及政局演变上，从中选举区制到小选举区制，经历了一党优势、多党重组，疑似两大政党制，再到一党独大；而在政体改革及央地关系上，又有围绕集权与放权、公平与效率的反复博弈过程。

日本政治的这些变化，对中日关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造成近年两国关系不断震荡的主动性原因。因而，不断提升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的质量，加深对日本政治演变规律、发展趋向及其对外影响的跟踪和分析，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和任务。90 年代初期至今，《日本学刊》刊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术论文，其数量在各种国际问题核心期刊中始终占据首位。可以说，《日本学刊》以其独具的园地和平台作用，在推进日本政治研究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火车头作用。

一 30 年学术研究成果

将 30 年的日本政治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阶段性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① 此处是指狭义的“日本政治”范畴，不包括日本外交以及安全防卫等领域。

② 集中体现在安倍试图以“安倍经济学”、“安倍国防学”、“安倍外交学”的三大综合政策，强势推动实现“夺回强大日本”、争做“亚太经济及安全主导者”以及“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的国家战略构想上。

特征。也即，在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政局重大变动期、体制及模式转换摸索期、政治思潮倾向明显变化期，以及与此相关日本安全及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动向的区间，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领域的研究往往会出现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现象。据此，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可分为起步奠基期（20 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早期）^①、提速发展期（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和快速发展繁荣期（21 世纪头 15 年）三个大的阶段。各个阶段划分的标准不仅是以论著数量的多少为依据，还着眼研究成果的理论突破即质量的提升状况。如果再细分的话，每一个大的时段又可以划分出具有一定特征的若干个小区间。

30 年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课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大类：（1）对日本政治体制及发展模式的分析；（2）对日本政治思潮（特别是右倾化及保守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分析；（3）对日本政党政治及政党体制的分析；（4）对政局演变及政坛变化的分析；（5）对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内政与外交关联）的分析。^② 以下就依据这几大类领域对 30 年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内容做一概观。

（一）关于政治体制及发展模式

《日本学刊》创刊以来的 30 年，也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具体而言，从冷战后到现在，在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宏观转型的背景下，日本政治中的诸构成要素，例如选民与政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策过程中的政官关系等，都处于深度调整及变化之中。

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的第一主题自然就锁定在对日本政治体制及模式的成功，即对创造“日本奇迹”的分析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8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政治背景、政治体制（尤其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现象等）、政治动因等要素一再得到重点关注，可观的研究成果也在那时出现。^③

第二主题是对日本政治体制及模式的转型、改革及混沌局面的分析。冷

^① 这个阶段的日本政治研究，很多偏重于介绍或解释，故在此不做详细论述。

^② 参见郭定平：《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回顾与展望》，载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③ 这方面的探索有：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理论与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王新生《政治体制与日本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等著作以及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日本学刊》2005 年第 6 期）、金仁淑《日本政治制度演化与经济绩效》（《日本学刊》2005 年第 6 期）等论文。

战结束至今,伴随经济长期低迷,日本政治开始进入持续动荡时期,因而体制改革及政界重组等便成为日本政治研究的一大关注点。^①

第三主题是对日本政治体制及国家发展模式的宏观研究。包括从宏观与微观、从总结过去与预测未来的角度进行的总体分析。^②

(二) 关于政治思潮及政治文化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政治思潮尤其是右倾化和总体保守化通过对国家政策的规范作用也会给中国及中日关系带来影响。因而,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对日本的这种政治动向给予了持续高度的关注,对日本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背景及成因、定义及特征、表现及走向、对修宪等国家大计的影响等展开了诸多探讨,发表了不菲的学术成果。^③除此之外,政治文化等新研究领域也得以发掘和拓展,这进一步夯实了日本政治研究的基础。《日本学刊》在这方面可谓开风气之先,率先在国内刊登了相关论文。^④

(三)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党体制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的政党体制及其运作是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体系中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领域。各种涉及政党及其外围政治势力的政治现象及规律均被作为分析对象。其中,综合性研究、体制及形态转变研究、政党及政

① 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蒋立峰《自民党政治改革的实质及前景》(《日本学刊》1991 年第 5 期)、高洪《拉开帷幕的日本行政组织改革》(《当代世界》1997 年第 12 期)、张亲培《日本众议院选举制改革之研究》(《东北亚论坛》1999 年第 2 期)、徐万胜《日本中央省厅改革分析》(《当代亚太》1999 年第 10 期)、李海鹏《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日本学刊》2005 年第 5 期)、臧志军《论日本的新保守集权改革》(《国际观察》2006 年第 4 期),以及吴寄南主编《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年)、郭定平主编《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等。

② 例如成果有:王新生《日本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从各政治主体相互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5 期)、李寒梅《三十年来日本的政治转型与政党体制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③ 例如:彭曦等《冷战后的日本政治:保守化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吕耀东《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李莹《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王星宇《冷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李秀石《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年)等专著。有关对修宪影响的成果有:高洪《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抉择》(《日本学刊》2003 年第 1 期)、孙伶俐《修宪预示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解析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修宪报告书》(《日本学刊》2005 年第 3 期)。

④ 例如:武寅《集团文化心理与战后日本政治》(《日本学刊》1992 年第 1 期)、任志安《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日本学刊》1999 年第 3 期)等。

权运行是三大重点关注对象^①，而对各在野党的研究则得到进一步扩展^②。在研究成果的分布中，涉及自民党的占很大部分，比在野党研究的总和还要多，这与日本政治结构的历史与现状有很大关系。而民主党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对该党的相关研究也曾有大量涌现的现象。^③

（四）关于政局演变及政坛变化

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持续分化组合，引起了政权频繁更替、政局动荡不稳。这一宏大的“政治试验场”，成为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每次日本政局的重要变化都被作为研究界讨论和写作的热点题目。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政局演变以及政坛分化组合的特点与性质的分析，二是对未来政局及其带动的相关政策走向的研判。^④

（五）关于政治与对外关系

中国的日本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是从广义上和总体上考察日本内政（决策）与外交的关系，二是围绕特别个案（尤其是钓鱼岛事件）进行的一种案例分析型的剖析和考察，这也是进入新世纪后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关于第一类的研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包霞琴等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刘宗和《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郭定平主编《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建民

① 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成果计有：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张伯玉《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研究体制转型的成果有：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研究——1996年体制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曲静《日本政治改革后政党体制的变化》（《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研究政党政权运行的有：徐万胜《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等。

② 代表作有：曹田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华桂萍《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 如：徐万胜《论利益集团与日本民主党政权》（《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张伯玉《浅析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改革》（《日本学刊》2012年第4期）等。

④ 如：刘江永《论日本政局的历史性重大变化》（《日本学刊》1993年第6期）、凌星光《日本村山内阁诞生的背景及其性质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期）、鲁义《日本大选与政局走势分析》（《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吴寄南《新进党解散后的日本政局》（《国际展望》1998年第2期）、高洪《日本新型政治结构探析——以新进党解体后的政局走势为中心》（《日本学刊》1998年第2期）、王屏《日本政界重组拉开帷幕》（《日本学刊》2005年第6期）、高洪《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等。

《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① 关于第二类的研究成果则有：翟新《日本民主党政权应对钓鱼岛事件的异常性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3 期）、吴寄南《试析钓鱼岛争端的日本国内政治背景》（《国际观察》2012 年第 6 期）、吴怀中《日本政治变动及其对华影响》（《日本学刊》2013 年第 1 期）等论文。

二 30 年学科建设倾向与特点

经过 30 年的发展，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成果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研究的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逐渐加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稳步进化，符合学术规范成果增多，知识创新得以推进。以上积极趋向与时间的推移呈正相关关系，进入 21 世纪后这种关系则更为明显。

（一）基础研究日臻扎实，应用研究持续推进

30 年来，日本政治研究中相对偏重于应用与时政研究的格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在上述五个领域的研究中，基础研究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分量。在有关日本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内政与对外关系的研究中，较为厚重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专著）已经陆续出版了至少几十部。如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等。这些著述在多方面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应用与时政研究自不必说，历来就是日本政治研究的热门和重头。例如，关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政党政治态势及走向、政局演变新动向、政治右倾化及其

^① 该类的论文还有：桐声《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日本学刊》2005 年第 6 期）、徐万胜《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外交评论》2012 年第 6 期）、张瑶华《日本政坛动荡对其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5 期）、孙承《试析日本鸠山内阁的政治与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2 期）等。

相关影响的论著，在数量上远超基础研究的成果部分。30 年来《日本学刊》发表的有关日本政治研究论文的数量及比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理论探索及概念创新有所突破

经过多年的积累，在一定基础上，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界开始摸索自主创新，在理论构建、概念生成方面，力图开始有所作为、有所突破，以早日掌握学术话语权，占据学科建设的高地，引领相关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例如，一个时期国内关于日本“右倾化”和“保守化”研究成果迭出却总是很难准确说明日本政治生态现状及实质，针对此现状，日本研究所的学者们以《日本学刊》为主阵地，连续发表多篇有力的论文^①，适时起到了引领问题研究方向的作用。其中，《日本学刊》曾以卷首语的形式刊载了桐声《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一文，指出：“之所以用‘民族保守主义’概念来归纳当今日本政坛上的主流政治意识，是因为迄今人们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种种界定，并未能够完整、准确地究明其本质。尽管‘政治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新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等概念从某种角度捕捉到了日本政治发展的某些特征，却未能阐明日本政治结构变化的本质和动因。”^②对照之下，民族保守主义的概念界定，即“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政治的系统理论和主张，其本质是激进保守的执政理念中夹杂了浓烈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较好地概括冷战后日本政坛主流政治思潮的流变和特质，及时发挥了解释现实、引领研究的作用。

此外，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还就日本政党转型及体制提出了自创的定义和概念，例如本质上属于“准一党优位制”的“1996 年体制”，以及自民党强势主导政坛的“2005 年体制”等。^③

（三）方法论的运用日渐成熟

日本政治研究对方法论的运用日渐成熟，在如下两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一，较为成熟地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运用于日本政治研究。毋庸

① 如：吕耀东《试析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性》（2006 年第 5 期）、张进山《当代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生成、概念和释疑》（《日本学刊》2007 年第 3 期）。另外，日本研究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日本民族保守主义课题组”，以推动相关研究。

② 桐声：《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日本学刊》2004 年第 3 期。

③ 例如：徐万胜长期跟踪研究日本政党体制的变化，主张从 1996 年成立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到 2009 年民主党击败自民党实现政权更替，14 年间日本形成了本质上是“准一党优位制”的“1996 年体制”。

置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推动日本政治研究发展进步的基本手段。多年来,运用经典的政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不断增多。例如,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政党政治在日本现代化历程中的结构与功能,探讨了日本政治过程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治》基于政治学中经典的政治过程分析法,再加以制度、结构的辅助视角,深入剖析了当代日本政治的状况。而王新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一书则基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郭定平的《论战后日本多元化》(《日本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将“多元主义政治分析法”引入到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中。张伯玉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方法来分析日本的政党体制及其与政治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一书尝试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建构一套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框架,然后运用这一框架寻找解释影响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动力的各项因素。该书结合运用西方选举制度理论来分析日本,实际上挑战了迄今国内所未尝试的领域。

第二,逐步尝试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集成加以运用。正如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一样,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往往能更好地开辟相关研究的新天地和新路径。例如,高洪《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一书,采取宗教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揭示了日本当代佛教与国家政治生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依存关系。淳于森冷《宪政制衡与日本的官僚制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则尝试采用政治学、历史学、法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既有成果,对战后日本官僚制民主化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文献查阅和归纳等主要方法,对二战后日共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了重点分析。

三 挑战及前景

日本政治研究需要兼具高度的理论水平以及对日本政治现实长期跟踪的学术积累,在整个日本研究中并不属于热门和显学。比起直接与中日关系紧密相连的外交安全与经济领域,日本政治类的成果在数量上从来不占优势。如表1

所示,即便在《日本学刊》这样的业内权威期刊上,日本政治类论文的数量比重仍然相对较小。根据笔者的统计,在进入新世纪后的 2000 年到 2014 年间,《日本学刊》上发表的日本政治类论文比重仅占全部论文的 9% 左右。

表 1 《日本学刊》刊载的政治类论文情况 (2000 ~ 2014)

(单位:篇)

年 份	政治类论文	总论文数	政治类论文比重 (%)
2000	5	92	5.4
2001	9	83	10.8
2002	6	83	7.2
2003	7	83	8.4
2004	11	78	14.1
2005	13	88	14.8
2006	13	94	13.8
2007	6	96	6.3
2008	6	95	6.3
2009	9	92	9.8
2010	5	96	5.2
2011	7	93	7.5
2012	10	80	12.5
2013	7	74	9.5
2014	6	59	10.2
总 计	130	1456	8.9

《日本学刊》创刊 30 年来,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学术成就,并有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对于学界和政界加深对日本政治和政局变动的理解、正确判断日本政治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日本政治研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瓶颈和问题挑战。

首先,依旧是专业研究理论不足、后继乏人的问题。虽然学界号称从事日本政治外交研究的人员数量众多,但细分之下即可发现,大部分研究者平素都在从事热点(外交、军事安全、争端冲突)议题的跟踪和分析,真正专注于日本内政问题的研究者数量却是少之又少。这一现状与日本政治学科的地位不相符合,也无法满足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因而,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与方式来扩充队伍规模,必将有力地推动日本政治学科及相关研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其次，是在研究方法论和路径上仍面临着规范和创新的问题。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日本研究将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准确地把握日本，将日本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然而，迄今为止的日本政治研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仍是较为单一的政治学方法——而且这种政治学方法的运用本身尚存有诸多不足之处。今后，日本研究学科应该力争进一步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统计计量学、社会心理学、博弈论等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和成果，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日本政治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开分析论述，以期能够发现和提出中国的日本政治学界所独有的分析、解释和结论。^①

最后，日本政治研究在选题和学术站位上存在一些偏颇的取向，需要坚守作为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学界对于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日本政治动向和政策调整比较敏感，跟踪也较及时，但对有些看似关系不完全十分密切的其他领域和部分，全局把握、总体研究和基础整理等工作则深入得并不充分。从中国近代开始，日本政治右倾化及保守化以及由此生成的外交及军事安全问题历来是国人关心的热点和焦点，特殊的“对日感情论”往往夹杂其中。而当今时代现代媒体的发达又直接助长了这一现象。如果对本国政治、法制、决策、文化与外交安全动向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缺乏深入的研究，那就难以有效地去判别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国内各种研究日本的力量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分工，重复跟“风”追“热”，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显得既不够深也不透。所以，中国的日本政治学者不能跟风走，要以正确的选题意识、专业立场和深入研究来为外界提供准确无误的学术成果。

30 年来，日本研究所及《日本学刊》已经在日本政治学科建设及课题研究中发挥了主阵地和主渠道的作用，相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效应。日本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及时准确地梳理、分析和总结日本政治的动态和走向，正确把握日本的政治变动的特性和实质，对于我们妥善判断和处理中日关系、塑造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周边地缘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学刊》应该在这一重要的学科领域当仁不让地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努力创新、开拓进取，在既有的基础和成绩上更进一步，为学术研究和政策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正因如此，《日本学刊》将大有用武之地，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① 日本中青年政治学者在运用定量分析与数量政治学方法的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等的方法论，近年出版了多部有关日本选举制度及投票行动、政党体制等的重量级学术著作。代表学者有谷口将纪、竹中治坚、上神贵佳、菅原琢、饭田健、大川千寿等。